

序

宛
祝
平

1931年9月18日22时30分，日本军队以密谋策划的柳条沟事件为借口攻击沈阳的北大营，北大营的东北军与之进行激战，但终因不抵抗命令制约，于19日晨3时许遵命突围，直至19日6时30分，日军全部占领北大营。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9月19日4时30分，日军开始攻打长春宽城子护路军兵营。至上午11时10分，宽城子护路军撤出阵地。此战日军战死24人，伤33人；护路军战死70人，被俘386人。19日凌晨5时许，日军向长春南岭大营发起突然袭击，中国官兵奋勇抵抗，战斗持续到下午2时30分，前后历时九个半小时。此战日军战死43人，伤55人。随后，黑龙江省代主席马占山领导了“江桥抗战”，陆续有东北抗日义勇军、东北抗日联军、挺进热辽地区的关内八路军等军事力量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这说明日本的侵华战争是从1931年9月18日开始的，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也是从这时开始的。抗日武装斗争从未停止过，直到1945年“八·一五”光

001

序
言

复。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在东北的党组织根据新形势调整斗争方针。中共满洲省委于1931年9月19日在沈阳召开了常委紧急会议，讨论了东北沦陷后党的方针政策。各级党组织发动人民群众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运动，在领导东北人民抗日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起到了主导作用。

除了武装斗争和共产党地下组织活动以外，在东北沦陷区还有一批国民党爱国人士坚持反满抗日斗争。他们不惜牺牲，为收复东北失地而进行着抗日地下活动。他们的处境十分险恶，曾付出过惨重的代价。由于祺元、徐春范先生编著的《东北沦陷区的国民党》一书记载了这些人的奋斗过程，向人们展示了国民党爱国人士为抗日救国所作出的贡献。

根据本书记载的材料看，国民党在东北沦陷区组织发展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成立的时间较晚，处境艰难。本书介绍的国民党地下组织“东北调查室”，是1938年成立的。另一个组织“东北党务专员办事处”，是1935年选派东北籍青年罗大愚到日本留学，1938年回国，经赴重庆受训回到东北后，于1939年正式建立起来的。在东北开展工作只有6年多一点的时间。但这期间，是日本在东北统治成熟期，各种统治机关正常发挥作用，开展地下活动很困难。他们的工作范围还不够广泛，更多的是秘密发展组织，没有组织起较有影响的事件，与东北民众的联系也不密切。因而收效不明显，影响也不大。国民党地下组织从开始建立，就屡受打击，到1945年竟被一网打尽。尽管如此，不能否认，他们的斗争是全国人民抗日斗争的一部分，应该在东北的抗日战争史中占有一定的地位。

第二，组织不统一，没有形成合力。国民党在东北沦陷区的地下组织，主要是两大系统，即“东北党务专员办事处”和“东北调查室”。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朱家骅认为，这是个很好的“双轨制”，这两个系统可以同时东北开展工作，并驾齐驱，互相监督，一旦一个系统遭不测，另一个还可以发挥作用。实际上由于国民党内部政治上腐败，派系斗争极为严重，保密程度差，“双轨制”引出两个恶果。一是被敌人利用，各个击破。二是因派系之争，内耗严重，削弱了自己力量。

第三，名称多变，内部关系复杂。因派系不同，又因时常遭到破坏，多次进行组织调整和变更名称，甚至至今尚健在的一些国民党爱国人士虽然参加过抗日地下组织及其活动，但因受到当时的环境和地位的局限，也很难对国民党在东北的抗日组织及其斗争情况有一个比较全面、系统的了解。例如“抗战大联合”、“读书会”、“东北抗战机构”、“东北调查室”等都是“东北党务办事处”和“东北党务专员办事处”的别称或下属机构。后来两者合并为“东北三省党部”，实际也是个明合暗不合的联合体，内部仍然各有自己的势力。

第四，为国民党在东北奠定了组织基业。1928年6月，张学良承袭其父张作霖之职，担任东北保安总司令。12月29日，张学良与东北军将领张作相、万福麟等人联名通电全国，宣布东北三省服从国民政府，“改旗易帜”。在此之前东北属于张作霖的家天下，国民党在东北没有什么机构，只有少量零散的党员。1929年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两年多时间，国民党虽开始着手建立一些组织，但“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在东北的各级组织陷于瘫痪。海内外爱国人士成立了

“东北抗日协会”，简称“东北协会”，属于人民团体性质组织，总部设在上海。主要是向海内外募捐，秘密策动全东北的抗日组织，开展对日伪的情报工作。国民党从经济上支持东北协会，向该组织秘密发给津贴。国民党中央常委陈立夫借机让国民党立法委员齐世英（陈的亲信）以中央委员身份参与东北协会工作。并经常以这个人民团体名义为掩护指导东北党务。但是受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基本政策的影响，国民党在东北沦陷区的组织建设很慢。直到逼蒋抗日成功，国共再次合作，国民政府军队投入抗日战斗以后的1938年，才先后建立起以石坚为首的“东北党务办事处”（即东北调查室，后来的东北三省党部）和以罗大愚为首的“东北党务专员办事处”。这两个组织到1945年均遭到严重破坏。

日伪垮台后，东北沦陷区的国民党组织得到一定的恢复，被俘的领导人罗大愚和石坚幸存下来，他们召集旧班底，重新组合，接受国民党新的任务。实际上，东北沦陷时期国民党的地下组织，成为国民党在东北的组织基础。

国民党在东北沦陷区的存在和发展情况，过去的史料并不多，《长春文史资料》也没有涉及过这个内容。这次编辑的《东北沦陷区的国民党》比较系统地介绍了国民党在东北沦陷区的两个大的派系，从中可以看出这个时期东北国民党组织的基本概况。这就为我们的文史资料增加了新内容，也填补了一个空白。

2005年7月10日

目 录

序 言	1
第一章 东北党务专员办事处	1
一、罗大愚东渡日本，成立“东京读书会”	1
二、建立“抗战大联合”	8
三、建立“东北抗战机构”（东北党专）	14
四、东北党务专员办事处及其基层组织机构	15
1、辽宁省党务专员办事处	16
2、吉林省党务专员办事处	32
3、长春市党务专员办事处	35
4、黑龙江省党务专员办事处	44
5、哈尔滨市党务专员办事处	48
6、驻日党务专员办事处	51
五、“一二·三〇事件”和“贞星事件”使地下组织遭受 惨重损失	56
1、“一二·三〇事件”始末	58
2、“贞星事件”始末	62
3、东北党专系统各地方组织被破坏情况	64

六、重整旗鼓，重建组织	69
1、为保存实力，工作一分，掩护一分	70
2、重新聚集力量	70
3、举办干部培训班	71
4、吸取教训，改革体制	80
5、制定《东北地下工作计划大纲》	83
6、各地党专成员重组抗日团体	84
7、积极进行组织发展	96
七、东北党务专员办事处的直属工作机构	98
1、东北通讯社	99
2、东北宣抚委员会	107
3、东北文教委员会	108
4、东北党务经济建设委员会	110
5、东北革命烈士纪念图书馆	110
八、东北党专的主要接头、联络据点、通讯设施和掩护 工作	112
1、接头、联络据点	112
2、通讯电台	115
3、交通联络	116
4、掩护工作	117
第二章 东北调查室与东北三省党部	120
一、东北调查室	121
1、东北调查室建立始末	121
2、东北调查室的主要活动及通讯地址	124
3、东北调查室各分室组成人员情况	126

4、伊作衡和王觉脱离石墨堂，改换门庭	131
二、东北三省党部	133
1、罗大愚出任辽宁省党部书记长	134
2、蒙骗郑辅周，火并李光忱	136
3、东北三省党部事件	138
4、东北三省党部事件中发生的冤案	144
第三章 东北铁路党部筹备处	147
一、王文宣奉命组建锦州铁路党部	147
二、筹建东北铁路党部	149
1、哈尔滨铁路党部筹备情况	151
2、吉林铁路党部筹备情况	151
3、齐齐哈尔铁路党部筹备情况	152
第四章 罗大愚事件	154
一、日伪警宪搜捕罗大愚的行动部署	154
二、张宝慈在沈阳被捕	158
三、长春的秘密通讯地址被发现	159
四、窃听到罗大愚的声音	163
五、日特巧施“美人计”	165
六、胜利冲昏头脑，盲动带来灾难	167
七、罗大愚在长春被捕	169
第五章 狱中纪实	174
一、在狱中创办《牢狱之花》	175
二、狱中饱受磨难	176

1、残害致死	177
2、折磨虐待	177
3、毒打惩罚	180
4、勒索财物	182
5、侮辱与奴役	182
三、刘凤卓挺身劫狱，罗大愚等死里逃生	184
附 录	189
一、罗大愚的回忆选录	189
二、《工作计划大纲》（“八纲十二部”）	218
三、王长新自传摘录	224
四、我参加党专后的主要活动	230
五、我是怎样参加党专的	234
六、徐寂石自传摘录	237
七、伪满建国大学的抗日活动	241
八、伪建国大学的“东北抗战机构”	253
九、一个新闻记者的自述	256
十、李季风越狱记	261
十一、王觉喋血记	285
十二、记王用中狱中之死	293
后 记	298

“东北党务专员办事处”1939年设立时只称“东北党专”。要了解它的建立和发展，必须从罗大愚1935年奉命东渡日本，在留日学生中开始组织“东京读书会”、“抗战大联合”，到1938年回国后筹建“东北抗战机构”等地下秘密抗日组织说起。因为罗大愚系统的党务工作，一直是以群众团体之名为掩护秘密开展的。特别是“东北党务专员办事处”的主要骨干力量，又都是以留日学生为主，是在上述外围地下组织中经过精心培养、考察而吸收到党内来的。因此，“东北党专”是在极其特殊而复杂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一、罗大愚东渡日本，成立“东京读书会”

罗大愚，原名罗庆春，化名魏忠诚，辽宁省辽阳县刘二堡镇五道口门村人。1910年12月生。1923年于辽阳县刘二堡镇高小毕业后，进

入奉天省立第一中学学习。1929年到日本东京东亚学校学习日语。后因东北币贬值，无力支付学费，翌年回国，就读于北平辅仁大学社会经济系。其间，因返乡服伺母病和料理母亲丧事，荒废学业达数月之久，不能再返校继续。遂转入北平中国大学经济系，于1935年毕业。此前，因参与创立“九·一八”学会及其活动，曾与“东北党务办事处”常务委员梅公任（梅佛光）、“东北协会”总干事齐世英交往密切。

1935年6月，梅公任和齐世英向国民党中央党部建议，应从中国留日学生中培养和吸收爱国青年，他们既懂日语，又熟悉日本情况，待回国后有利于参加反满抗日工作。这个建议经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朱家骅（兼中央党部组织部长）批准，并决定对外以“东北协会”名义选派东北籍优秀青年赴日留学，以此身份为掩护到日本在中国留学生中秘密发展组织，宣传抗日救国的思想，待毕业回国后，吸收他们参加地下抗日活动。当时从东北三省中共选出12人为派遣对象。经过反复筛选，最后只选出罗大愚、贾桂林、郑辅国和赵喜桂等4人。按照规定，他们须先回东北，取得伪满国籍和领取留日护照后，才能赴日。后来，贾、郑、赵三人因学费不足，不久辍学。留在日本的只剩罗大愚一人。

罗大愚接受派遣任务后，依恋不舍地离开了学习和生活过的第二故乡——北平，迎接新的任务和接受新的考验。1935年7月，他乘火车经山海关回到辽阳老家。此时东北已经沦陷4年，家从乡下搬到辽阳市内，他的户口早已注销。其兄罗庆宣读过几年私塾，在家务农，但对敌伪官场情形还比较熟悉。负责调查学历和办理留日许可证的是一个伪满洲国辽阳市公署教育科中国人官吏，他是个鸦片瘾者。罗兄便投其

所好，请他到鸦片烟馆吸烟。烟瘾过足后，他满口答应帮忙。在警察局方面，也经罗兄百般周旋、行贿，才取得伪满户籍和领到留日的出国护照。这两件事办妥后，罗大愚便向其父兄提出两点要求：一是希望家里能及时提供他在日本留学的费用；二是伪满将实行“遗产税”，应将家产先分成三股，各立门户，以免因自己从事地下抗日工作一旦被捕而株连父兄。后来罗被通缉时，伪警特果然去罗家调查盘问过，罗的父兄均以早就分居另过为由推卸了责任，减轻了许多麻烦。

1935年8月末，罗大愚告别了父亲、兄嫂和妻子（陈亚珍，后因患肺结核病故，生二女移居美国），由沈阳乘火车经安东（今丹东）到朝鲜，再转乘轮船抵达日本东京。他沿途经过中、朝、日三个国家，好像从人间进入地狱，又从地狱进入天堂。在朝鲜境内，从车窗望去，看到一片凄凉、贫困和落后的景象。一座座茅草屋，简陋不堪，人们衣着褴褛，面带饥色。罗大愚见此情景无不愤慨！他感到朝鲜已被日本帝国主义啃得只剩下一根骨头，现在又想吞噬中国东北这块肥肉！在釜山至下关的轮船上，日本警察对外国旅客盘查甚严。在下关口岸查出罗大愚于五、六年前曾在此口岸入境的记录，经过反复对照查问后才放行。随后并将此记录转递给罗在日本居住辖区的警察机关备案。当时日本是一个警察统治的国家，特务林立，警网森严，把中国留日学生列入“要视察人”，进行严管监视。留日学生自入境后便开始调查登记，随时记载他们有什么社会关系和与什么人接触。还责成房主对掌握的东北留日学生的言行、生活起居状况及来访客人等情况，经常及时地向警察当局报告。另外，伪满驻日使馆对留学生的思想、行动，亦有专人掌握。在东京设立的

“留学生会馆”也在掌握和监视留学生的动态。日本其他的大中城市，留学生虽然不多，但被监控的程度都是一样的。

罗大愚到达日本东京后，进入东京法政大学经济部研究生部学习。初到日本时，人地两生，只与在东京法政大学法律研究生梅庆春有来往。因为梅是中央政治学校毕业生，经东北教育救济处派送来日留学。其父就是梅公任（梅佛光）。梅公任“九·一八”前曾任辽阳县师范学校校长，东北沦陷后去北平，属于国民党CC派，任东北党务办事处常务委员，对外的公开身份是“东北协会”会长、国民党中央委员。罗被派往日本从事地下抗日活动也正是由梅氏指派的。因为这层关系，梅庆春自然成为罗在东京的惟一知心的朋友。他们经常可以毫无顾忌地交流思想，往来频繁。

要开展工作，必须从争取同志入手，这也是开展秘密活动非常艰巨的工作。首先必须取得对方的信任 and 了解，才能交流思想和进一步从政治上进行启发开导，从感情和认识上真正达到志同道合，进而吸收到组织中来。由于日本占领我国东北，中日两国处于战争状态，每年从东北去日本留学的学生很少，1935年时约有五、六百人。罗大愚对这批留日学生的政治态度作了这样估计：“这些青年都是知识分子，想要为追求个人利禄而作汉奸的是极少数人；甘心情愿作顺民当亡国奴的也是少数人；但是在日本帝国主义淫威之下，不顾牺牲而奋起抗日的，同样是少数人。”（摘自台湾出版的罗大愚纪念集《山高水长》）

正当罗大愚开展工作举步维艰之际，其侄女婿赵允衡1936年春到东京，找他帮助联系办理入学手续。见面后，罗大愚看出他很聪明机警，是一个追求新思想的青年。因为又

是亲属关系，政治上可靠，便决定先把赵作为第一个争取对象。后来，赵允衡又把在东京读书的中学同学张宝慈和在东京一高读书的高士嘉、刘世恒等三个人介绍与罗大愚接触。他们都是辽阳人，相处格外亲近，经常聚在一起促膝谈心，探讨东北青年应如何为恢复东北失地而投入到火热的抗日斗争中去。

1936年5月，罗大愚为进一步考察赵允衡、张宝慈、高士嘉和刘世恒等四人的政治态度，一天把他们找到自己的宿舍里。罗对他们启发说：“我们的家乡已被日本侵占，虽然我们现在的日本过着优裕安逸的生活，学成后回东北还能获得高官厚禄，但我们不要忘记，家乡的父老兄弟姐妹们，正遭受敌人奴役和蹂躏之苦，我们回东北能袖手旁观、坐视不管吗？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是炎黄子孙，绝不能做背叛祖国的事情。不能贪图个人的荣华富贵，给日本人当汉奸走狗，为虎作伥。我们东北青年要担起重任，首当其冲。要为争取生存，收复失地，抗击日寇，洗雪国耻而奋斗！”罗大愚这番慷慨激昂的发言，感动得大家无不热泪盈眶，热血沸腾。当场一致表态：愿意跟着罗大愚干，不怕流血牺牲，坚决把抗日斗争进行到底。

经过一段时间，罗大愚认为把大家已经发动起来了，在政治上、思想上已接近一致，不组织起来，还是一片散沙。为了稳妥、不发生意外，决定先成立一个过渡性的国民党地下外围组织，取名为“东京读书会”（“东北留日青年工作核心小组”）。除了这些人参加组织外，还吸收梅公任之子梅庆春参加该核心小组，并主持培训工作。因为他不是东北籍学生，不能回东北工作。“七七事变”后，回到甘肃，任酒泉

东北沦陷区国民党的

法院推事。

罗大愚按着每个人的校址和住址编成两个组。赵允衡和张宝慈一组，高士嘉和刘世恒一组。该会还通过决议：会员禁烟戒酒，不说谎话，不打麻将。课余时间，分头到图书馆借阅哲学书籍，轮流传阅。每周召开一次碰头会，由罗大愚向大家介绍中国及世界的政治、经济形势，然后集体讨论学习。小组会开会的程序规定有：

- 1、向祖国致敬礼；
- 2、默唱国歌（国民党党歌）；
- 3、默祷，为救国而默念；
- 4、报告和讨论在读书方面存在的问题和开展相互批评。

此外，还轮流主持会议，并宣读《总理遗嘱》。

经过“东京读书会”（“东北留日青年工作核心小组”）这一段活动的考察，罗大愚认为发展组织的时机已经成熟。1937年夏季，张宝慈、高士嘉、赵允衡和刘世恒等四人被吸收参加了国民党。每人交两张照片，办理入党手续，举行入党宣誓仪式。至此，罗大愚在东京以亲属和辽阳老乡为基础，建立了以他为核心的地下国民党组织，开始在日本国土上秘密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此时，罗与张宝慈、赵允衡搬到东京本乡区一所公寓内居住，并作为机关所在地。

罗大愚经常注视和分析日本国内外形势。1936年2月26日日本右翼主战派的陆军第一师团1400多人和少数近卫师团士兵在东京发动了武装暴动事件，矛头直指日本内阁，史称“二·二六事件”。这一暴动虽被天皇镇压下去，但日本军部的强硬派仍在疯狂地推行对外扩张的军事侵略政策。日、德签订《防共协定》，意大利也随后加盟，形成“日德意轴心国”。

国内发生“西安事变”后，罗认为：“政府统一为之加强，中国不再容忍日本做进一步侵略，亦为全国一致意向。如果日本再次发动战争，必将遭到中国全力抵抗而导致中日大战……”（摘自台湾出版的罗大愚纪念集《山高水长》）。

为了团结广大的中国留日学生，启发他们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热情，选拔吸收一批优秀分子参加抗日组织，壮大地下抗日队伍，罗大愚决定1937年暑期举行一次富士山集会和组织一次赴北满进行实地考察，以策划下一步在东北开展工作的布署。当他们正在富士山集会时，日军已在北平西南发动了“芦沟桥事变”，拉开了全面侵华战争的序幕。高士嘉在《山高水长》中这样批注：“廿六年（1937年）暑假，日本军阀占领东北五年之后，正在秣马厉兵将侵略矛头指向全中国。大愚兄在此关键时刻，发动一次留日东北青年大集会。因为东京高师和一高等均在富士山的山中湖畔建有学生可以食宿的“寮”，核心小组成员和不少东北籍留学生都前来度假，同登富士山，并游山中湖。也交换各自对中日战局的推测及各自因应之事。当时与会的还有潘宏志、乔钟洲、李金声、沈正功、杨顺有等人。我们是于6月前往，在到达热海之前，沿途看到军用车辆结队驰行，已知战争迫在眉睫了。”

富士山集会后，核心小组成员利用暑假机会回东北对北满进行考察。他们由日本新泻乘船经日本海到朝鲜清津港，渡过图们江搭火车经延吉、敦化到哈尔滨。罗大愚、张宝慈随杨顺有赴黑河；赵允衡前往承德；高士嘉和刘世恒回到沈阳。最后，他们在沈阳碰头，交换沿途见闻，商讨今后开展工作的对策。

二、建立“抗战大联合”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中国被迫进行了全面的抗日战争。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同全国人民一道，对日本侵略者同仇敌忾，义愤填膺。罗大愚等核心小组成员结束对北满实地考察后，于同年秋返回日本东京。罗大愚根据变化的战争形势，认为应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充实和壮大抗日力量。他将张宝慈、高士嘉、赵允衡和刘世恒等人召集到东京“井之头”公园开碰头会。在会上他提出：“‘七七事变’是民族战争，中国青年要坚决支持抗战，使中国最后走向胜利道路。同时也必须解决满洲问题。为此，中国留日学生一定要回国参加抗战。”大家对支持抗战问题取得一致意见，但对立即回国参战问题则持不同意见。

同年10月中旬，罗、张、高、赵、刘等五人在东京小石川区白山御殿町公寓又召开一次会议，讨论如何参加抗战的问题。会上罗大愚说：“我们人数少，应再聚集更多的人，在积蓄力量方面必须为将来做组织准备。”大家同意他的倡议，决定以“东京读书会”为基础，重新建立一个秘密抗日团体，叫“抗战大联合”。这样旗帜更加鲜明，有利于动员东北留日青年联合起来，积极地参加抗日救亡运动。

“抗战大联合”的宗旨是：联合东北各界、各阶层、各民族的志士，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少，为救国，为子孙后代的生存，共同抗战奋斗。同年秋，罗大愚发表了《我们的认识和奋斗》一文，并印成小册子传阅。在文中指出：“这次对日抗战是中华民族面临最后关头的民族革命战争。为求生

存、反压迫、争自由、图发展而奋斗。”随后又制定《呼吁抗战宣言书》、《抗战大联合工作大纲》和《抗战工作注意事项》等文件，发给各成员秘密传阅。这些纲领性文件对指导抗日行动，激励大家的抗日斗志起到重要作用。

早在“抗战大联合”成立之前，高士嘉就开始有意识地接触在京都帝大学习的王宏文（王长新，吉林大学教授，中共党员，1995年病故），考察他的政治态度。高士嘉向罗大愚汇报王的情况时说，王宏文有“左”倾表现。罗大愚为亲自再考察一下王宏文的政治表现，于1938年3月某一天，经高士嘉介绍，在东京与王宏文见面。据赵允衡回忆：“当时我和罗大愚住在一起，地址是东京小石川区白山御殿町公寓。罗回到寓所后对我和张宝慈说：‘老高真胡闹，老说王宏文‘左’倾、‘左’倾！这次我和王宏文一谈，他完全同意我们的主张，同意参加组织。’”（据赵允衡自传。存于鞍山市第一中学1969年人事档案）1938年，王宏文经刘世恒介绍，和李东（京都帝大学生）、王志先（东京帝大学生）一同举行宣誓参加“抗战大联合”。

经过“抗战大联合”骨干成员的积极努力，通过各种形式进行物色、引导、考察和严格把关，使该组织得到不断发展和壮大。到1940年参加“抗战大联合”的留日学生有：

张宝慈（章树成），辽阳市人，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学生。

高士嘉（化名施仲文、栗深），辽阳市人，东京一高及京都帝大学生。

赵允衡，辽阳市人，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学生。罗大愚侄女婿。

刘世恒，辽阳市人，东京帝大农学部学生。